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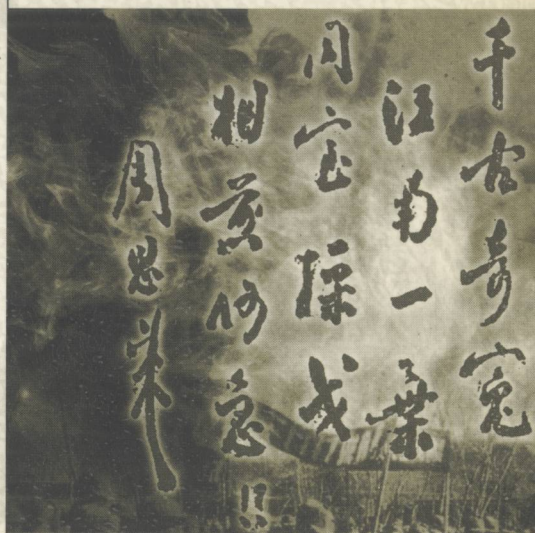
抗日
戰爭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黎汝清 著

皖南事变

WAN NAN SHI BIAN



大眾文學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二辑:抗日战争)

皖南事变

黎汝清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序

石 言

一部具有突破性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问世了。这是一部政治上大胆而审慎的、文学史学方面丰富而缜密的、军事上有研究价值的、社会学哲学方面思虑颇深，教训深刻的多功能的巨制。它具有斗争史诗和心灵史诗交融的特点。它值得有识之士、有心之人一读。

它不是《百年孤独》，不是《世界末日之战》。它有中国古典军事文学真实而浪漫的情节，有纪实小说型的确凿的历史依据。真实性是它的生命。思辨性是它的灵魂。

这部近 60 万字的长篇，出自 60 岁老作家黎汝清之手，尤为可贵。“老作家要超越自己！”这是我们南京军区创作室同人的口号。勤奋刻苦而博闻强记的老黎首先实现了！

1984 年春，老黎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说给我听，说是写皖南事变和突围人员的。我听完不大满意，认为写的不是皖南事变，也缺少皖南突围人员特点，而且仍然没有脱出你黎汝清自《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以来的艺术格套。你老黎结构能力强，想象力活跃，写作勤快，出长篇多矣，是“节育优生”的时候了！我悄悄地和一些出版社的同志们约好，待老黎把此稿送给他们时，请他们给老黎“当头棒喝”，以逼他另写，逼他突破（此事到我现在下笔写评介时为止，老黎尚不知道），因为老黎是有能力突破的，却被

出版社“宠坏”了，送一部出一部，容易安于现状。

一逼之下，老黎便酝酿了今天问世的《皖南事变》。新的计划使我大为振奋：以项英、叶挺为第一、第二主角，正面地写皖南事变的全貌。这恰好针对黎汝清的两个老“毛病”。

一是人物的两极化和“三突出”——无论项英或叶挺，都是既有大优点又有大缺点，作者无法使其“高大全”，无法一个英雄一个狗熊，搞“两极分化”。

二是生活整体把握不够，作低层次（英雄化、两极化、情节化）的虚构——正面全貌地写皖南事变，历史本身将吸引作者深入开掘和研究极其丰富复杂的生活矿藏。

我们期望黎汝清这一次将大大地超越自己过去的成就，也期望《皖南事变》将对我国革命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新的经验。

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将《皖南事变》全文发表了。读者、批评家和史学家会有各自的想法。我，觉得老黎的成果超过了我的期望。

皖南事变可说是我当年参加新四军的动因之一。16岁的我当时是上海民立中学同学会的负责人。我们印制校刊的小印刷厂为上海地下党印刷了《论军纪》、《皖南事变真相》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罪行的小册子，我曾“不告而取”了几本，在高中几个班级秘密传阅。自此，我学过的马列主义便和抗日反顽的现实直接联系起来。大残杀的结果是更多人的觉醒，这是我们这辈革命青年当时的感受。

参军45年来，由于在精锐主力部队参加过几十次作战又多年研究党史军史，对革命战争与战争人物的感受当然又有不同，不会像初次上老山的诗人那样感受最强烈的只是流血与死亡，对于皖南事变及以它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就有较深的思考。

长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优势之一是它能够在整体上把握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在整体上把握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

所谓整体，就不是局部的、瞬时的、单侧面的、单层次的，其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单一而定型的；而是全局的、过程的、多侧面的、多层次的，其主要人物的性格不仅复杂多面而且有其发展史。

喜欢空灵的作者对此说会有反感。可是长篇军事文学不想写重大题材则罢，否则，对于历史、社会、人物的了解、思考和表现非如此不可。不能满足于短暂浅表的主观感受，而是要大量全面深入地搜集材料，要剖析、研究，以加强感受、理解与升华。要向史诗追求，不但是斗争的史诗还是心灵的史诗。作品不仅要有大的审美价值，还可以在史学、哲学、心理学、军事学等等方面有相当的价值。

这就有赖于对生活的整体把握。

全局的、过程的、多侧面的，许多作品已有了宝贵的实践；矛盾的多层次性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史方面，目前还比较薄弱。一个千米深的富矿若只知其一二层，一条曲折的长河若只漂其一二段，是可惜的。

黎汝清在他的这部力作中对整体把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多层次开掘和人物性格变化发展方面的成果尤为突出。

写众所周知的皖南事变，本来很容易使小说情节的开展简单地依托历史的进程，把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力量的这个主要矛盾覆盖全书，作浅层次的、简单本质化的处理。或者，也可像老黎过去那样，根据一些壮烈动人的传说材料作出大量的同一层次的虚构。如若这样，就凭皖南事变本身所具有的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可写成内容丰富、可读性颇强的长篇小说，但很可能突不破长篇

小说的旧的格套。

这一次不同了，老黎详细地占有了材料，更严格地甄别和研究了材料，并和我们这些老军史研究者反复责疑。我们高兴地看到他通过研究对主要史实主要人物的把握超过了我们。

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三分之二。他们蓄谋已久，要在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最有利的时机对新四军下毒手。这是无疑的。他们所谓的“陈粟似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即是其自供。整个的顽我矛盾的强化、激化和转化，是第一个层次。

但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顽固派的罪行是外因，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顽固派迁就、退让、丧失警惕则是主要的内因。当然，也还有一些次要的内因。如：新四军领导核心的政治生活不够正常；叶挺的只会打正规战；苏北新四军的攻击韩德勤部重镇曹甸，使蒋介石立意不准皖南新四军向东经苏南北渡到苏北等等。事实不少。按此写来，会比较深刻。这可算第二个层次。

但是项英为什么会受王明路线的影响？项英失败的原因及他的意图是否全属右倾？

在1939—1940年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此伏彼起之时，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周围构筑了相当严密强固的防御工事，警惕性很高。他的战略意图则几乎一贯是向南发展，“远征闽浙”，到老苏区去恢复和建立南中国的大根据地。他先是想等日寇打通浙赣铁路把国民党三战区逐出该地区时乘机占领和扩大地盘；后是准备一旦发生突然事变国民党军进攻云岭军部时他依托预设工事坚守死顽继以突围出击直趋闽浙。总是打算到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域去建立根据地，就不是右而是“左”了。至于项英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原因就很复杂。有他和中央苏区多年以来的战斗联系血肉深情，有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纠葛和现实

分歧,有他率部撤到江北后必得交出军权调去延安的苦恼,还有对王明及共产国际的看法,等等。这些都触及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和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第三个层次。我觉得《皖南事变》十分可贵之处便在于深深地触及了这第三个层次,这是我们以前都未能做到的。要说突破,这就是突破。

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需要过硬的材料,也需要对材料的研究和推论。但无论历史学家或作家都难以获得已故人物内心深处的“硬”材料。项英内心深处的思想活动,他没有记在日记上,最知情的同志也从未提供过。所以对某些重要情况和关键问题,只能用旁证来判定或推论。有的旁证较“硬”,如项英的要远征闽浙向南发展,在中央军委和陈毅致项英的电报中均有明文记载。有的却只有间接的旁证。如项英率皖南军部及主力如果向南突围成功将到苏南南部“待机北渡”,恐怕反会以“待机而不得其机”为理由长期留驻江南待机南进,这就缺乏直接的旁证了,只能根据众多事实作逻辑推论和合理想象。历史学家是不能如此着墨的。作家却可以而且应该如此。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如黎汝清,根据许多旁证,根据项英的性格发展及各种主客观因素,在更高、更复杂、更深刻,因而更真实的水平上写出了项英的内心矛盾。

外部矛盾、内部矛盾、内心矛盾、内心深处隐蔽曲折的矛盾,通过对项英所面临的和具有的多层次矛盾的描写,皖南事变以及这一悲剧的第一主角项英的质的整体就基本上把握住了。

然而项英的形象还概括了更多的东西。

他虽是产业工人出身,小农意识却相当浓厚。他最舍不得受损失、丢“家当”,所有贵重的东西,尤其是干部,他都爱装在自己的“兜兜”里。(这,当然有对党的事业和财富十分负责的好的一面)甚至在突围出来住在山洞里时,金银钞票还是大部集中地带在自己和副参谋长身上,以致露财被害。凡是 he 害怕会遭袭击受损失的行动,他都犹豫不决,结果恰如陈毅所预言:“五心不定,输个干

净。”他和叶挺军长在政治、思想、作风、生活各方面都格格不入，作为新四军党的主要负责人他却缺乏团结叶挺、充分发挥叶挺所长的度量。当然，叶挺也有自己的弱点。由于种种原因，他曾被怀疑是蒋介石派来控制新四军的。嗣后毛泽东亲自热情欢迎和赞誉，但项英对叶挺的许多不像无产阶级军队的做法始终不敢放心。叶挺绝大部分时间是有职无权，这也是皖南失败的重要原因。叶挺偏逢项英、项英偏逢叶挺，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大玩笑，同时却也是领导班子组成上的很不合宜的历史僵局（新四军的干部只有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余的人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军长又只能是叶挺）。项英的小农意识使他“狭隘而不开展”，做不好叶挺的工作。我敢说，项英、叶挺二位中任何一位换成陈毅，皖南事变的结局就会很不一样了。

项英和刘厚忠的关系有社会学的意义，耐人寻味。刘厚忠是个小人物，却有较强的典型性，他说明我们中国农民小生产者组成的广阔深厚的原野正是封建家长制的林莽藤蔓滋生的土壤。封建家长制和军队的纪律性混淆起来，势力尤为强固。封建家长制是皖南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党中央严肃指出、华中局扩大会尖锐批判了家长制之后，我国受家长制的毒害竟越演越烈，原因之一，就在于还是这块“土地”，还有这些意识。而家长制在本质上又是极为虚弱的。在封建家长制控制之下，斗不过敌手，甚至杜绝不了小人的背叛。项英死于忠顺的奴才刘厚忠之手。而这封建意识很浓的奴才居然还在项英头颅的枪洞上贴上送灵钱。由此可以看出，黎汝清不但整体地把握着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在不少地方还超越了实生活的构架，有了延伸和升华，增加了这部小说的哲理性和社会文化意义。

整体地把握人物（以及他们所折射的历史长卷）还在于写出他们的性格发展史。北伐时期的叶挺，“二七”大罢工时期的项英，都是彪炳千秋的英雄人物。斯大林亲赠项英自来水笔和手枪，赞誉

他为中国唯一出身产业工人的革命领袖人物。他在工人运动中、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以及在苏区中央局，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有些复杂事件他的处理是比较正确的。他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他对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的总结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勤谨严肃，热爱干部战士与群众，在许多方面能以身作则。八省游击队的“山大王”们下得山来进入富庶的江南“花花世界”，没有他这样的领导人还很难迅速形成正规稳定的局面。叶挺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对城市暴动盲目进攻有独立的见地。他刚直勇毅，敢于提出意见，因而和当时共产国际的意见相左，以致脱党十年，深深悔恨。他们都历经坎坷和锤炼，到了新四军，他们各自的际遇又是如此特异和艰难，各自的性格特点和性格矛盾都发展到极至（具体的到第二部分再作分析）。大优点和大缺点交织，大起大落和大喜大忧交织，通过这样的性格发展史，我们可以更深地感受和理解皖南失败的原因，也可以更深地体会到革命者人生道路与自我改造的艰苦。

二

主要人物的两极化，敌我、反正人物之极恶极善、全对全错，这是我国军事文学的老习惯老格套。长篇小说有充足的篇幅可以从整体上把生活的复杂性渗合性真实地表现出来，却依然较普遍地存在着人物两极化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一种幼稚的状态。

“妈妈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当然决不是说应该敌我不分，是非无别。而是不要在作品中人为地集中优劣美丑，搞两极分化。这道理现在每个作家都承认，但写起来，却常常脱不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原因颇多：

我国自古强调阴阳善恶的对立。辩证法对立统一的法则在封建统治阶级有意的宣导下僵化成为只讲对立、不讲统一的绝对化

观念。封建统治阶级最需要给自己塑造十大全身，给对立面则百般丑化。千百年流风所及，人民的美丑善恶观不断受到压榨和切割，造成了一种简约化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的突出的一点是尊者至美、卑者至丑。

我国的极左思潮继承了一些封建僵化的观念，并用对于社会矛盾的绝对化认识和实用主义的需要强化了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定势。试看需要赞颂某人的光荣事迹时，一切皆美，甚至夸大虚构；一旦需要批判他时，便一切皆丑，同样可以夸大虚构。当事之人若不按此调说话，便很背时。极左思潮对于两极化的形而上学猖獗，并不只是一时的浅表的扰乱，而是继承和发展。

作家自己也会堕入两极化的窠臼。神化与脸谱化虽然已引起了注意和反对，但整个社会的思维定势却从各方面影响作家的作品。有不少机密档案特别是有关领袖人物的机密档案迄未“解密”，无从查阅；当事人、知情人有意隐讳；作家自己浅尝辄止，没有深入搜集素材；作家限于思想水平或有顾虑因而未能发现或未敢表现矛盾的复杂状态等等，都可以使作者失去整体把握人物的可能，笔下“禹则百善、跖则十恶”。老黎过去的长篇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个弱点。

这一次不同了。老黎在前人搜集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自己又作了辛勤认真的采访、阅档和考证。对于项英的调查研究尤为深透。于是，他看到了项英、叶挺许多为世人所不知的秘密，看到了他们作为人，作为久经锻炼久历坎坷的人，胸怀革命大志和个人雄心的人的真实面貌。（当然，还会有一些听说过的或推想得到的素材他没有找到，也无从想象。在重要的人物关系、政治联系方面只好留下空白）但现有的很为丰富的层次颇深的材料，已足够使黎汝清粉碎他比较习惯的两极化的构架了。写项英的彻底错误吗？他不但有许多突出的优点，而且在他皖南转移的种种谋虑中，除了有他隐蔽的个人得失之外，也还有他对革命的忠诚和远虑。就拿

他 1940 年准备在顽军挑起突然事变时远征闽浙的计划来说吧，党中央也并未绝对否定。项英之于转移，拖延时日是为错误的，违背中央指示的，并且是笨拙的。但他的南进计划却未必全无道理。他若提前几天突然秘密南进，他不会遇雨阻滞，顽军第四十师也未及赶到三溪、星潭一带堵口。皖南部队完全可以顺利到达天目山西北苏浙皖交界地区“待机北渡”。而“待机”实际上是扯皮，因为日寇常要封锁“扫荡”，顽军常要袭击阻挠，北渡的“机”可以久待而不得。一年之后，日寇为策应太平洋战争，终于实行了项英盼望了三年的打通浙赣铁路。原驻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逃往闽西。项英经略浙赣路沿线敌后、执行“三山计划”的宏图不就可以实现了吗？如此，粟裕带领的新四军第一师的主力就没有必要在 1944 年从苏北重新渡江、南进天目山以图打开浙闽沿海战局了。当然，皖南主力若能于 1941 年初北渡长江，对于进一步发展最关重要的华中地区，肯定是更有利的。以上的假设，只是说明未可把项英的意图看成为绝对的坏事而已。

同样，能把叶挺写成“高大全”的英雄吗？这样当然也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以转移的方案和作战决心来说吧。用叶挺之计，从国民党五十二师与日寇之间东进苏南，无疑较为正确。在三路会攻星潭受挫时，用叶挺的方案，再度强攻，并且还要突破顽军的纵深堵截和退击，是否能够突围成功，就没有极大的把握了。（时至 1979 年，当年的军部侦察科长、突围时的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还曾告我：他在星潭前沿一带亲自看过，山洪下泻，水大，大部队很难连续突过河川与封锁）坚守石井坑，死打硬拼，中央虽一再指示用游击方式和分批分道前进，他却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不善此道也不敢按此执行，生怕部队失控溃散。部下劝他带少数警卫人员及早钻隙突围，他严词拒绝，而要像将沉的战舰的舰长，矗立甲板上誓与战舰同归于尽。“死守硬拼至最后一人”，在叶挺是英雄行为，是他性格的必然外现。而客观上，却是失误。

由此可见，在生活中，一个全善、一个全恶，一个全对、一个全错的现象可能是有的，但绝大多数人不是如此。我们从这部有大量真实生活作艺术依据的《皖南事变》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么一些状态：

同一个人有正确也有错误、有美也有丑，何者是主导常随时间、地点、事件而转移，总体上何者是主导决定着这个人的基本面貌，但并不能因而抹杀其另一面。

同一个决策中同时包含着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两种以上的因素与可能，也同时包含着或潜在着决策者的高尚和卑狭的两种以上的心态。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可能和心态，因为战争情况和人际关系的极端复杂，常呈不确定的或然性模糊性的状态。大忠大智大勇与大诈大愚大怯之间，功臣与罪人之间，界线并不总是分明的。

人的性格发展史中会有似乎违背其一贯性格的突变。这往往是在高压下的扭曲，是其性格更加深化的发展。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更需慎重，更有胜境。这具体地表现为人物的“高点”和“低点”混淆，“二律背反”。这是黎汝清在写作《皖南事变》中在性格问题上的重要发现。

黎汝清看到：项英和叶挺在皖南事变中都发生了“低点”的现象，反常的出人意料的“低点”。领导“二七”大罢工和三年游击战争坚定持重不怕牺牲的项英，在新四军负党军政全责的项英，最不应该离队的项英，竟在全军突围不得、面临崩溃时不告而去，离队脱逃。而大节凛然、宁死不屈，绝不肯从狗洞爬出的叶挺，竟在石井坑向蒋介石发电报卑词请罪求缓。（此电发延安请党中央转重庆，党中央未转）最不应该“弯”的叶挺却似乎卑躬屈节。

黎汝清发现，叶挺的这件事未必是低点。读者们从《皖南事变》这部长篇的开头一直读到此处，也会感觉这对于叶挺的性格来说，甚至是另一种高点。叶挺能对准正向他俯冲扫射的日本战斗

机拍照，他的视弹雨如草芥的无畏精神是有名的。他的愿意赴重庆“请罪”，显然是为了保存这支忠勇的抗日部队，保全大批他痛心地脱离过十年的英勇的革命战友。峣峣者竟主动弯曲，忍辱负重，其悲愤壮烈之情，读者可以想见。

项英的事更为复杂，他潜行整夜未能走出重围，又回到军部，威信尽失。他的这种行为，对当时的士气当然不利，受上下的谴责势在必然。但黎汝清从项英的性格发展史来看，认为项英的出走决不是保命，而有他自己复杂的思考。他对全军北调，本就是反对的，无路可走而陷入重围，在他看来正好证明北移的不妥。是是非非，尚无定论。毛泽东一度被认为右倾，失去军权，如今领袖全党。安知将来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对皖南部队的问题又如何看法？这些当然都是黎汝清的推论。但是，几天后即在与顽军遭遇时举枪自杀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湖南阻南十分坚决的副参谋长周子昆，都是很有水平的好党员，他们都愿意跟项英一同离队率先走脱，也可见他们也曾一度认为项英的做法不无可取之处。从项英来说，他不会认为自己是临阵脱逃。大落大起，在以往的游击战争史上是常事。只要领导核心在，只要不被俘，部队可以收拢，战局可以重开。事变后他在丕岭以西山区聚集到七十余名骨干便宣称有条件在皖南以至南方重新打出一个局面来，便显示了他离队出走时心灵的一角。正是从这里，还可看到复杂的全方位的矛盾对项英、对事变的影响。

打破两极化构架的另一种结构因素便是全方位的矛盾。以项英为中心，与部队干部战士、与群众、与统战对象、与国民党人员、与军部机关各种干部、与同级干部、与胡服陈毅、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以及与蒋介石、顾祝同，均有不同性质的矛盾和联系。在这些矛盾和联系中，显示了项英多方面的性格。其中，他和党中央的电报往来（尤其是元月一日那份用尽心机的电报）以及他和刘厚忠的关系，最能反映我党某些老干部在许多优点掩盖下的封建性的

一面。他们爱部队、爱群众、爱战斗开辟的地区，却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些都是“我的”。红色割据的深层意识中有封建割据的因素。在中国，兵权意味着其他的权力，而党政军民的全权更是一切荣辱得失之总汇。与刘厚忠以及赵令波的关系则是封建家长制的人事关系，也就是所谓“我的”人。项英之死，也正是死在这两条上。这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然而在我们党内，这两条是否根本克服了呢？

打破两极化的重要一着是敌对方面人物的处理。在这里老黎也有可贵的收获。重要人物蒋介石、顾祝同都没有脸谱化，他们的艺术形象代表着宏观整体的另一面。从蒋介石的立场说，他的行为也符合“理由充足律”。共产党不断发展武装和地区，目前说来首先有利于抗日，将来的长远目的却是革剥削阶级的命，这是毋庸讳言的。他本该大举反共，只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他的根本利益，不肯大幅度退让；全国人民坚决抗日，不敢违逆；而英美拉得又紧，苏联还肯支持。算盘反复敲打，坚持抗战还是有利有望。这样他就不能全面反共投降。但是他若有机会狠狠削弱共产党，那是决不会手软的。老黎写蒋介石的心态，很有真实感。尤其是皖南事变他取得大胜之后，反而有孤立感和危机感，更为深刻。因为蒋介石毕竟是有权谋、谄韬略的雄才，他不会不感到人心向背的严重意义。

顾祝同这一人物更是丰满。这是我国现代军事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对立面”人物。他的对叶挺的感情并不是虚假的。从他身上简直可以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学少年投笔从戎的壮志、国共合作东征北伐的友情、十年“剿共”的飞黄腾达与疲惫感叹，三年半抗战的老练深沉和衰退腐败。对他的着墨并不多，但因为准确、生动，其形象跃然纸上，不仅有瞬间的光彩，其性格的发展史也隐约可见。

在我国的革命军事文学作品中，这样深入地开掘和实事求是

地描写革命将领的长篇小说，我个人没有见到过。彻底地打破神化、英雄化，又并不把对立面人物丑化、兽化，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态度，是摒弃两极化的有效途径。

三

老黎所取得的重要的成果和可喜的突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我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有价值的艺术方法。而是就《皖南事变》这样的有较强纪实性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而论，调查研究的功夫和现实主义的方法，确实显示了强大的威力。黎汝清自己说：“遵从了历史人物的真实，不是作者去支配人物而是活生生的人物在支配作者。丰富的史料，增强了历史的规定性，限制了作者的随意性，给典型人物增加了依据性、参照性、真实性。因为作者把握了历史及人物的总体，才突破了‘一体两极化’的格套。”

前文述评过的一些跌宕最大的情节和最富心理特色的细节，如项英的离队、叶挺的请罪、刘厚忠的贴送灵钱，都不是作者的凭空虚构或神来之笔（老实说，最特异的情节和细节如果没有来自生活的“原子核”是形成不了的），都是实有其事。我决不是轻视想象。我自己的小说总是虚构远多于实生活。但想象如果只根据少而浅的生活与素材，又没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那种想象很可能是低层次的；或者是两极化的想象——美化神化与丑化兽化；或者是虚无化的想象——不论敌我正反人物一律丑化兽化，回归“原我”。老黎这次广阅深研，他两极化的老“毛病”就大大地破除了。当然，对于皖南的风土人情和语言，对于当年的新四军干部以及地头蛇敌人，他掌握的素材还不够丰富。所以有些虚构的重要人物和人物关系如林志超、郑芳雪、林志兰等写得比他过去小说中的更真

实、更有韵味、更有思辨性；但不少人物，尤其是敌方及反面的人物，还不免有两极化的痕迹，还缺乏很强的乡土时代味和历史真实感。我更不是轻视作者的主体作用，主张跟着素材依样画葫芦。实际上，现实主义的方法要求作者发挥极大的主体作用。且不说搜集材料需要付出巨量的劳动，需要慧眼“识宝”；在掌握了大量材料之后，研究，剖析，判断，表达，推论，发现，岂是随心所欲那么容易的？画鬼易，画人难，画被许多人熟知与争论的人更难。黎汝清之所以能把项英、叶挺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的文学典型塑造好，正是因为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主体的作用。他是革命四十多年的老党员老军人，而且当过兵团一级党委会的秘书。对于高级干部在各种尖锐矛盾面前的各种脸相和心态，比你我要熟悉得多。

老黎的主体作用不仅发挥在形象上美学上，还有意识地发挥在其他方面，这就使这部长篇小说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具有多功能。

首先当然还是在美学价值上。经过了一番空前的努力，老黎的透视、想象、塑造的能力立刻提高了层次。写出来的人物既非超人又非原我，既非类型又非畸形，而是“这一个”。尤其是项英，许许多多的人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自己这样那样的优点、缺点，但从总体上说，他却是绝不重样、空前绝后的“这一个”。唯其如此，这形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宏观与微观结合得更好，这形象的启示作用就更大。杜鹏程在《保卫延安》中首次写了高级将领彭德怀的形象，被当时的评论家誉为盛事；吴强在《红日》中写了副军长梁波的爱情及军长沈振新的刚毅性格，也被评论界认为是创新。如今《皖南事变》中的项英、叶挺、周子昆、顾祝同、林志超等人物，特别是项英，其真实、丰富、复杂、深刻的程度，其对于两极化构架的突破的程度，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人。不知当代的评论家们会作何评价。

作品中的美学价值，从广义来说，并不和同一作品中的哲理、军事、社会等方面的价值相对立，因为后者亦有思辨之美、剖析

之美、智慧之美。

《皖南事变》的史学价值是显见的。黎汝清对皖南事变的研究与考证，其史学成就在某些方面（不是全面）不下于军史学家。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体会。我与吴克斌对黄桥决战的某些研究，不但比写此电影的老朋友要深一些，也比一般的史学家要深。因为我们敢于剖析陈毅与胡服在统战策略与作战方案上的矛盾，归纳出陈毅“独立歼韩”的核心指导思想。这是任何军史论文中都没有述评过的。此说得到粟裕、叶飞、钟期光、王必诚等黄桥作战领导人的认可，也得到不少党史军史家的同意。当然，《皖南事变》是小说，不能像史传文学那样当信史来读。但在主要人物和重要史实上，黎汝清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和深入的探讨，弄清了或基本弄清了一些不实的史料，使历史的真面貌更为清晰。在这基础上，再加以集中、突出、推论、渲染和合理的想象，这部小说的历史真实性还是值得党史军史家们参考的。同时，更欢迎党史军史家提供前未知的材料和批评意见，使反映这一个历史大悲剧的作品能得到不断的补正。

作为战例来研究，《皖南事变》在军事学上也有其特殊的价值。我国古代的军事研究，不但研究“军”和“战”，还研究“将”，研究敌我双方的将帅的利害关系、作战习惯和指挥心理，甚至研究其生活起居、健康状况等等。反映在《三国演义》中，这方面的智慧颇多，使《三国演义》至今具有军事价值、运筹价值。最近，我国军事科学战线大大加强了对著名将帅个人军事思想的专题研究。而在实践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略计谋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把战争及时地引回到蒋管区便是这种研究的伟大成果而由刘邓陈粟等坚决执行了的）。毛泽东常指定某一战役须由某将领指挥，就包含着这种“军”、“战”、“将”结合的深刻研究。同一部队、同一战斗，不同的主将或参谋长就会有大大不同的结果。《皖南事变》这部长篇小说把战争研究和将的研究结合起来，整体地把握了项英、叶挺的革命经